

“长期以来,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渲染使我们普遍认为,高利贷是一个和‘剥削’相等同的概念,放贷者自然地就是剥削阶级或恶棍,心太黑。于是,我们轻松地得出结论:消灭高利贷的办法是打倒放贷者,关闭民间金融。”

——摘自陈志武《金融的逻辑》

近日,一则“重庆市高院首次支持民间借贷按照利滚利收账”的报道,引起了强烈反响。监管层及司法层面对民间借贷的态度,再次成为公众揣测的焦点。

民间借贷亟待规范化

“民间借贷光想捂是捂不住的,它的大规模存在有其存在的道理,在银根紧缩的时候,它的规模肯定会随着需求而扩大,化解风险的根本方法,是将民间借贷这些地下金融阳光化。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徐滇庆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表示

“现在民间借贷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,我预计今年年末,民间资本风险会出现大的爆发。”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电话中忧虑地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表示。

周德文并非杞人忧天。不久前,江苏泗洪县即被爆出民间高利贷崩盘,村民活埋上线灌辣椒水讨债;福建厦门也接连爆出民间高利贷崩盘大案,并且有担保公司及银行高管涉嫌介入。

同时,在资本市场上,放贷现象也开

【专家观点】

“高利贷不一定是十恶不赦”

记者了解到,对于民间借贷的发展,银监会已经从试点民营银行开始破冰。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,当前开展民营银行的最大障碍,是银行牌照的发放与退出问题及监管人才的匮乏。

同时,对于如何化解当前的高利贷困局,有关学者建议,在金融体制改革与引导逐利资金投向上下功夫。

叶林(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):根据我国金融法规规定,企业之间禁止私相借贷,公民参与的借款最高利率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,超过者不予保护。但是,对高利贷的认定标准,我国法律却从无规定,在其他国家法律中,至今也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法定标准。

高利贷的风险不言而喻,如果约定的贷款利率有效,借款方企业可能因此破产。很多公司或企业是在管理者控制之下进行高利贷的,许多借款是管理层不顾股东利益而以极高利率借入款项。

徐滇庆(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):高利贷没什么定义,所有的贷款都和它的成本相关,成本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叫风险。我承受的风险越高,当然利率就收得越高。不存在什么叫低利,什么叫高利,利益是在商业谈判之中构成的。

老百姓通常说的高利贷,是指比银



【新闻背景】

新中国高利贷 60 年间史

1950 年—1980 年
国家全面垄断金融借贷

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,“高利贷”等民间金融一直被认为是勤劳而获的经济剥削。

从 1950 年代初期开始,中国禁止了所有的民间借贷,由国家全面垄断金融借贷,任何民间金融机构都变为非法。

民间借贷行走在法律盲区 高利贷最大风险无法可依

重庆市高院出台的《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规定:出借人根据约定,将利息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(俗称“利滚利”),只要约定利率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

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,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严峻,央行在回收着流动性。银根紧缩与民间借贷的跷跷板效应再次出现。
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“疯狂”。不少受访专家、学者甚至用“全民放贷”来形容当下的形势。



企业。

二是多数涉足高利贷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,这说明大型公司资金并不吃紧,中小企业才是银根紧缩的受害者,国家应当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上下功夫,尤其是提供其融资平台,不能只顾大企业和国有企业。最近有消息说,国家正在筹备跨部门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构,要充实它的职权,尤其是在资金方面予以扶植。

三是应该积极报道高利贷做法不被法院接受的典型案例,让闲散资金的拥有者知晓高利贷的法律风险,减少公众参与高利贷活动的概率。尤其是,以往在多种非法资金案件中,报道和宣传的重点在于国家如何反对非法集资,却没有把高利贷的事情当回事,公众并不十分清楚国家在高利贷问题上的态度,也不太注意高利贷的风险,这使得高利贷现象越来越严重。

徐滇庆: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把地下金融拿到桌面上来,阳光化。不去引导,光想捂是捂不住的。应该给好的地下金融公司银行牌照。银行牌照并不是很神秘的东西,主要是要有退出机制,发现不好,立即将牌照收回。退出机制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。而现在情况是,一旦给了一个金融牌照,似乎就万年不变了。现在的难题是,很难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真的要做民营银行还是借机来圈钱。

周德文:现在的金融监管机构很尴尬,因为它无法可依,民间借贷目前还没有立法,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对的,是不作为,明明有危险。

一出了事情,政府要追究责任了,说你是非法集资,你是高利贷,就开始打压了,实际上就是推卸责任。这种情况不应该再延续下去,我国的民间借贷的合法化,已经喊了十年,但非常遗憾到现在路子还没有走出来。放贷的条例、委托贷款的条例到现在还没有出台。

要解决这一问题,唯一的办法就是走民间借贷的合法化,不要去堵,要去疏。起到带动经济发展润滑剂的作用。在相关法律没有出台的情况下,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,至少应设立一些民间借贷的检测机构,监测点,要及时关注它的动态。

(摘自《中国经济周刊》文 / 李勇)

上市公司放贷 不务正业

贺强(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):上市公司做起了“小银行”是不正常的。上市公司的资金应该投向公司的募投项目;同时,由于放贷的利率高,其风险也很大,对业绩的支撑不可持续。

要对放贷的上市公司具体加以分析,看中间有多少是央企,多少是民企,他们的放贷有没有违反规定,资金的来源是哪里。投资者如果觉得上市公司这种获取收益的方式有风险,可以选择用脚投票。

叶林:上市公司如果低息借入资金,却高息放贷,这相当于低价买入商品后再高价卖出,无疑属于一种营利行为;因为该种行为是以货币为经营对象,不是非金融机构的常规业务形态,确为不务正业;在极端的意义上,甚至就是原来所说的“超越经营范围”。另一方面,无论是银行贷款或者招募资金,都应事先确定其资金用途,“转贷款”的做法,同时违反了预定的资金用途。

无法可依是最大的风险

叶林:高利贷现象是与资金或资本的逐利性连在一起的,也与我国口号上反对高利贷,事实上却没有遏制高利贷现象联系在一起,应当从多方面着手缓和与高利贷带来的问题,尤其是从宏观而非微观入手加以解决,否则,即使在个案中否决了高利贷,却无法在社会层面上减少高利贷现象。

一是提供好的投资品种,满足资金逐利性的需求。比如香港交易所刚推出的 ETF(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)产品,再如上世纪 90 年代的含保值贴补的国债。民间资金是逐利的,民间资金规模巨大,一定要为其找到光明正大的资金出路,否则,必然会以隐形方式提供给

温州老板“落跑” 民间借贷或难过年关

8 月 30 日,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纸公文,禁止黄建策等 28 人高消费,包括不能旅游、度假,不能乘坐飞机、列车软卧、轮船二等舱,不能住星级以上宾馆,不能去夜总会、高尔夫球场消费,子女不能上高收费的私立学校等等,原因就在于此 28 人没有履行还款义务。这是最高法院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规定出台后,鹿城区首次公开发出限制高消费令。

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,温州民间高额借贷春节期间可能出现突发性风险,比如会上演欠款老板“落跑”潮。

老板“落跑”已经开始

就在限制高消费令出台的前一天夜晚,鹿城区鞋材龙头企业“耐当劳”老板戴志雄,拖欠 200 多名员工共计 1000 多万元工资之后仓皇跑路,而他拖欠供货商货款数目,还在统计中。

“耐当劳”生产鞋底,是家有 20 多年历史的企业,在温州当地小有名气,平时经营得还不错。但从今年年初以来,生意一直走下坡路,“原来一个月最多 50 万双的产量,现在少了一半。”戴志雄此番“毫无征兆”地跑路,是由于资金链出了问题。

餐饮公司“波特曼”和“港尚记”的老板严某夫妇也加入了逃跑的阵营。在今年 4 月份“落跑”之前,严某夫妇给员工留下 20 万元现金、银行卡和 4 辆汽车等资产,说是给员工发工资的。在落跑之前,严某夫妇给有关部门留了一封信,称自己经济上出现危机,希望政府出面协助。据知情人透露,严某欠银行的贷款约有 370 万元,高利贷欠款数目不明。

资金链崩裂不仅发生在制造业、餐饮服务等领域,许多炒房者同样身处资金困局。8 月中旬,网上传出温州楼市“一夜入秋”的消息,炒房者因资金紧张而低价出售房屋套现,“每平方米 4.1 万元的学区房单价直降 5000 元”。虽然恐慌性抛房仅仅是个案,但中介郑小姐称,温州房价在 7.8 月间整体下降 10% 已是事实。“现在房产投资者的资金链紧张,压力确实很大。”温州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秘书长卓宋说。

“落跑”现象在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得以证实:“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,借贷人估计今年大约有 10%~15% 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,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经达到 8000 亿元到 1 万亿元。”

部分银行资本介入

资金崩盘、“落跑”的背后是高昂的民间借贷利息。贷款利息分为两种,一种是有抵押贷款,一种是无抵押贷款。有抵押贷款月息约为 2 分,短期无抵押贷款的月息是 6 分到 8 分,3 个月以上的长期借贷则为 3 分到 6 分之间。

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 7 月 21 日发布的《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》,温州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是 1100 亿元人民币,而周德文则稍有不同看法,他认为在 1200 亿元。

如此天量的民间借贷资本从何而来?

周德文认为借贷资本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:一是改革开放以来,民营经济不断壮大所积累的财富;二是从实业中抽离出来的资金;三是民间闲散资金,如煤矿投资不景气、楼市限购令、股市暴跌致使大量资本停留在温州;四是上市公司的资本金,这种情况在温州存在,但相对较少。

温州天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鸿持不同看法,他认为高利贷资本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:“本地人都有固定资产,拿这些固定资产去银行抵押贷款,贷来的钱再拿去做高利贷,赚取利差。也正因为如此,央行温州支行才得以统计出 1100 亿元规模的数据。”和周德文一样,陈鸿也认为,在高利贷流通的资本不止 1100 亿元。

而民生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报告则显示,民间借贷的主要用途有以下四个方面:35% 的资金用于企业生产经营,数额为 380 亿元;20% 的资金被投入到房产、集资炒房中,这项资金为 220 亿元;20% 的资金由民间中介借出,被借款人用于还贷垫款、票据保证金垫款、验资垫款等短期周转,也为 220 亿元。

在投向房地产的数目上,陈鸿认为更高:“大概有 50% 以上的高利贷进入房地产领域;其次,是做 PE 以及企业经营;还有赌博,高利贷和赌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产生各种资本丑闻。”

从紧的货币政策助推

《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》指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,全市有 89% 的家庭个人、59% 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。

高利贷一直存在于民间,为什么今年比以往更活跃?在浙江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维安看来,今年的民间借贷很不正常,至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程度。今年的经济环境与 2008 年上半年有很大相似性,二者同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、货币政策连续紧缩多年。尤其是 2008 年在 2007 年适度从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从紧,使经济增长下滑,民间借贷盛行。

但今年与 2008 年走向截然不同,2008 年下半年,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,政府为保增长而有了 180 度大转弯,贷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,许多资金链绷得很紧的企业,包括房地产企业因此得救。“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物价,这就意味着银根会继续紧缩,下半年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。”王维安说。

8 月底,央行扩大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缴存范围,等于回收了商业银行 8000 亿元到 9000 亿元的流动性,也印证了王维安的看法。

(摘自《中国经营报》文 / 何勇 杨晶晶)

